

前摇言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理论界的同人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在教育科学研究领域里,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在批判地继承优秀的传统教育理论基础,积极地译介、引进国外教育理论发展的新成果,教育科学研究领域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各种理论流派、各种观点、各种学说相互碰撞、交汇、融合,新的理论像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理论视野,更新了人们的教育观念,促使人们突破传统的教育思维模式,从崭新的视角思考教育问题。这些理论成果涉及教育活动的各个层面,对教育实践进行着全方位的引领与指导。

但长期以来,教育理论界与教育实践界存在着“两张皮”的现象。一方面,由于固有的学术传统的影响,有些理论研究成果或所阐述的原理失之于深奥,或学术语言失之于晦涩,导致其学术色彩过于浓厚,不易为广大教育实践工作者所掌握。教育理论工作者也受到了来自实践界的“理论研究脱离实际”的埋怨与指责。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的预测、解释、指导、控制的功能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教育理论的研究似乎成了多余的学术活动,遭受许多非议。另一方面,许多理论工作者针锋相对地指出,实践工作者无视理论的巨大作用,不学理论,不懂理论,不用理论,盲目地实践,导致实践中出现种种的混乱。这种争执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

20世纪年代初达到顶峰。至今,这种争论仍没有销声匿迹,仍在一定程度与范围内存在着。“教育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争论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了教育理论工作者的深刻反思。

理论来自实践并最终服务于实践。如果理论不为广大的实践工作者所掌握,理论的功能难以发挥,理论的价值与魅力何在?在当代中国,教育实践正进行着前所未有的改革。教育改革的实践迫切需要理论的指导与规范。教育实践者的改革热情急需教育理论工作者理性地引导,只有这样才不至使教育的改革失去方向,出现盲目与混乱,陷入越改越乱、难以自拔的泥潭。只有在科学的教育理论指导下,才会有科学的教育实践;只有在科学的教育理论指导下,教育实践工作者才能将自己的实践由自发的、经验的层次提升到自觉的、理性的高度,积极主动地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变革自己的实践。新的教育理论不应只存在于少数教育理论家的头脑中,或者仅成为少数教育学者谈论的话题,当然更不应仅蜷缩于少数面目深沉的学术刊物中。它们需要走向复杂多样的教育实践,为广大的教育实践者所理解、掌握、运用,并从中获得修正、完善与发展。只有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具体结合,才能焕发出教育理论的魅力,教育理论也才能不断地生长。

然而,教育理论是分层次的,提倡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并不是笼统地指所有的教育理论都与教育实践直接结合,甚至“混合”在一起。因此,不能苛求所有的教育理论都与教育实践发生直接的具体的联系。有些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的指导是直接的具体的,有些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的指导需要通过许多环节的转化。“教育理论下嫁”的工作显然迫在眉睫。

对于教育理论工作者来说,为广教育实践工作者遴选出当代教育理论中重要的、成熟的、典型的理论,以向他们系统地介绍,便于他们学习与掌握,这既是一项重要的任务,也是教育理论工作者应尽的职责。由于前面所述的原因,在教育理论研究领域里,向教育实践工作者深入浅出地介绍当代教育理论的研究成果

的书不多。而当代教育理论发展学派林立,观点纷呈,有些理论较为成熟,有些理论尚需发展,并需检验。因此,如何除纷去繁,摘其典型,确是一件困难之事。我们编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力求把握时代的脉搏,以审慎的态度透视当代教育理论五彩斑斓的花园,从中撷取精英,提供给广大教育实践工作者,为推动教育改革的深入尽一点绵薄之力。

本书撰写之际,正值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深入之时,它以服从和服务于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之需为根本宗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开展以培训全体教师为目标、骨干教师为重点的继续教育,使中小学教师的整体素质明显提高”。加强教师继续教育,增强教师的素质,建设一支优质高效、结构合理、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任务。这里介绍的当代教育理论研究的新成果、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对于更新广大教师的教育观念,形成符合时代精神的教育理念,转变他们的教育行为与方式,全面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很有帮助。为此,本书的撰写坚持以下原则:

一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介绍新教育理论的同时,尽可能地结合一些案例进行阐释与说明,增强理论的理解性与可读性,为广大教育实践工作者提供一些具体的实践策略与建议,既从理论上澄清他们一些模糊的认识,纠正他们一些错误的观念,也从实践上为他们提供一些可供参照与分析的范型。

二是全面介绍与重点突出相结合。尽可能地在书中将当代教育理论研究的新成果介绍给广大的教育实践工作者,以便他们了解当代教育理论发展的概貌。但由于当代教育理论流派纷呈,因此,很难在一本篇幅不大的书里对当代所有教育理论的新发展、新成果予以详尽的介绍。因此,本书介绍的是一些成熟的、重要的理论成果。

三是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本书的撰写力求深入浅出,晓畅易懂,用科学、准确的语言阐释教育理论,为广大教育实践工作者提

供理论指导 ,培养他们的教育理性。但同时 ,也注重理论的逻辑性与系统性 ,在注意本书的可接受性的同时 ,也注重逐步提升教育实践工作者的理论素养 ,培养他们的理性思维。

由于编写者水平有限 ,书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 ,在此真诚地希望各位读者在使用过程中批评与赐教。

编著者

二〇〇八年 猿月

第一章摇素质教育论	(员)
摇第一节摇素质教育的发展探迹	(员)
摇第二节摇素质教育的含义与特性	(圆)
摇第三节摇素质教育的实施	(猿)
第二章摇主体性教育论	(源)
摇第一节摇主体、主体性及其基本特征	(源)
摇第二节摇主体性教育概述	(缘)
摇第三节摇主体性教育的目的	(苑)
摇第四节摇主体性教育的过程	(苑)
摇第五节摇主体性教育的教学模式	(愿)
第三章摇情感教育论	(怨)
摇第一节摇情感教育的内涵	(怨)
摇第二节摇情感教育的价值	(员园)
摇第三节摇情感教育的策略	(员缘)
第四章摇创新教育论	(员源)
摇第一节摇创新教育的内涵	(员源)
摇第二节摇创新教育的环境与氛围	(员圆)
摇第三节摇创新教育的模式	(员源)
摇第四节摇创新教育的实施策略	(员缘)
第五章摇环境教育论	(员愿)
摇第一节摇环境教育概述	(员愿)

摇第二节摇中小学环境教育	(猿园)
摇第三节摇环境教育中的师资培训策略	(猿园)
第六章摇教育质量与效益论	(猿缘)
摇第一节摇教育质量	(猿缘)
摇第二节摇教育效益	(猿园)
第七章摇教育公平论	(圆园)
摇第一节摇教育公平的历史发展	(圆园)
摇第二节摇教育公平的理论内涵	(圆愿)
摇第三节摇教育公平的实践追求	(圆缘)
第八章摇闲暇教育论	(圆缘)
摇第一节摇闲暇与闲暇教育概述	(圆缘)
摇第二节摇闲暇教育的原则	(圆源)
摇第三节摇闲暇教育的实施	(圆愿)
第九章摇教师专业化	(圆源)
摇第一节摇教师专业化概述	(圆源)
摇第二节摇教师专业素质构成	(猿愿)
摇第三节摇教师专业化的实现	(猿猿)
第十章摇终身教育论	(猿愿)
摇第一节摇终身教育概述	(猿愿)
摇第二节摇终身教育的实践	(猿圆)
参考文献	(猿员)
后记	(猿圆)

第一节 素质教育的发展探迹

一、素质教育发展概况

素质教育的理论形成于当代中国,但是素质教育的思想发展在中国却有漫长的历史。先哲们在教育实践中,不断地探索与思考,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在这些经验中,孕育着丰富的素质教育思想。

西周时期的教育注重提高人的多方面素质。古代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课程,就体现了对人的素质的多方面的要求和培养。孔子注重理想人格的塑造,追求真善美多方面素质的培养。他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是“圣人”。“圣人”人格的核心素质是“仁且知”^①。他所培养的“君子”则是品德高尚、精通“六艺”“文质彬彬”的德才兼备的人才,其核心要素是“仁、知、勇”^②。孔子提出的“性相近”“习相远”的素质发展观,“有教无类”的教育均等思想,“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学而时习”“学思结合”的为学之方,“启发诱导”“举一反三”的教授之道,“学而不厌,诲人不

① 《孟子·公孙丑上》：“仁且知，夫子既圣矣。”

② 《论语·宪问》：“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又《论语·为政》：“君子不器。”即不局限于一才一艺。又《论语·雍也》：“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倦”的治学精神,都蕴涵着丰富的素质教育精神,可以说是素质教育的思想萌芽。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除孔子以外,孟子、荀子、董仲舒、韩愈、朱熹、王阳明、颜元等许多教育家,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素质教育思想财富。但是受阶级或历史的局限,他们所提倡的素质教育思想归根结底是为培养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人的素质,维护封建政权及士大夫们个人自我完善服务的。由于古代教育与生产劳动相分离,受教育者只是少数贵族阶级子弟,社会的知识积累相对简单,因此,提高的是少数人的素质。劳动人民的子弟多数未能受到正规的教育,只能在家庭和社会生产生活中有限度地提高自身的素质。科举制度的推行,制约着受教育者的潜能的充分发挥,也使受教育者个体的素质变得褊狭。这显然不是我们今天所提倡的素质教育。

在中国的近现代,伴随着国运的兴衰,教育思想家们对国人的素质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著名学者蔡元培强调国民教育应以“养成共和国健全人格”为根本目的,主张“五育”并举,全面实施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提倡发展个性与崇尚自然,要求按儿童“性质之动静,资禀之锐钝”而施教,促进儿童个性自然地自由发展,反对“教者以预定为目的,而强受教育者以就之”及注入式的教育。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提出“生活教育”理论,主张“教学做合一”,反对教师“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和学生“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强调培养学生的生活实践能力与创造能力,发出“敲碎儿童的地狱,创造儿童的乐园”的呐喊,提出“五个解放”(头脑、双手、嘴巴、空间、时间)、“五路探讨”(行动、观察、看书、谈话、思考)和“每天四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的要求,针砭了我国传统教育的痼疾,开启了新教育的大门。幼儿教育专家陈鹤琴首倡“活教育”理论,将教育目的划分为依次递进的三个层次,即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最终归结为“做现代中国人”。而现代中国人必须

具备五个条件：一要有健全的身体，以寓道德学问；二要有建设的能力，恢复文化科学事业；三要有创造的能力，重新唤起被旧制度束缚了的中国人的创造能力；四要能够合作，牺牲个体之小我，以成全民族之大我；五要有服务心，肯为社会造福。他还将“活教育”的教学过程分为四个步骤：一是实验观察，二是阅读参考，三是创作发表，四是批评检讨。这就将教学过程不仅视为接受间接经验的过程，而且是学生通过自学、实践，发展自己创造力的过程，凸显学生的主体活动在教学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像这样立足于实践，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发挥学生的主动性，解放学生的动脑，重视学生的探索与创造的教育思想，在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史上众多教育家都有共识。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由于政治、经济、战争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他们的这些进步教育思想很少能付诸实施，成为教育现实。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展开，教育实践有了较大的发展，为素质教育思想从理论到实践奠定了社会基础。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其进程缓慢，挫折亦多，发展道路曲折。

第一阶段：“文革”前 1949 年，应试教育盛行。

学生负担过重和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状况在“文革”前 1949 年就普遍存在着。1950 年，我国开始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制度。1952 年，教育部决定办重点中学，新中国的教育逐步走上了有序发展的轨道。但伴随而来的是出现了以应试和升学为目的的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教育现象。我国政府曾多次公开指出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及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并采取过一系列措施，力图解决这些问题。例如，1953 年 7 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减轻中小学生学习过重课业负担的指示》，指出了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种种现象，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措施与办法。1954 年 1 月，教育部又发出《关于当前教学工作中的几点意见》，要求各地制止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错误做法。1955 年 3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发的教育部党组《关于克服中小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现象和提高教育质量的报告》指出，

近来中小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现象有所发展,有些情况相当严重,最突出的现象是课程门类多,课外作业多,测验考试多,致使学生常常处于被动与紧张状态。

学生负担过重和片面追求升学率等问题,曾引起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于 1956 年 2 月指出:“现在初中学生上课的时间也多了一些,可以考虑适当减少。”^①他还于 1957 年 8 月 14 日在“北京一个中学校长提出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的意见”的批示中指出:“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进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②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由苏联介绍到中国,教育要促进学生全面而生动活泼地发展的问题引起广泛的重视。1957 年 9 月 13 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提出的“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③,对教育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广大教育工作者在党的教育方针的指引下,为提高受教育者德、智、体等方面的素质,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然而,十年动乱期间,不仅否定了前 1957 年的教育成就,而且造成了教育事业的倒退与混乱。正常的考试制度被破坏,缩短了学制,“精简”了课程,似乎解决了片面追求升学率和学业负担过重的问题,但其实是为一代人的素质带来了难以弥补的缺憾。

第二阶段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末,“素质教育”概念的提出。

自 1977 年逐步恢复全国统一考试的高考制度、研究生培养

① 毛泽东:《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1970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

② 毛泽东:《毛泽东论教育革命》,158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

③ 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170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

制度和学位制度。1978年恢复重点学校制度以来,全国的教育教学秩序迅速得到恢复,教育质量不断得到提高。与此同时,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和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又严峻地摆在人们的面前。邓小平于1978年9月《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学生负担太重是不好的,今后仍然要采取措施来防止和纠正。”在谈到考试问题时指出:“对于没有考好的学生,要鼓励和帮助他们继续努力,不要因此造成不必要的精神负担。”^①针对不少学校为追求升学率而忽视大多数学生的教育的状况,邓小平在1983年的教育工作会议上还提出了“要尽可能把全班学生教好”的思想。不久,时任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在全国中小学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中小学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②的要求。“中小学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的思想,对教育界尤其是中小学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

“素质教育”一词最早出现在《教育研究》1984年第5期中的《德育过程的阶段说》一文。文中的“素质教育”是指对学生的道德素质教育,显然与我们现在的“素质教育”的含义有一定的出入,但毕竟提出了“素质教育”这一重要术语。1985年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时,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用过“素质教育”这个名词。1986年,《贵州学院学报》第4期发表了题为《人才素质与素质教育》的文章,这是报刊标题中最早正式出现“素质教育”一词。1985年第5期《上海教育》(中学版)发表了评论员言实的《素质教育是初中教育的新目标》一文。该文指出:“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如何全面提高初中毕业生的素质,把素质教育作为初中教育的一个基本目标来抓。”并提到素质体系包括政治素质、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和劳动素质等。尽管该文素质教育的概念还不完善,但在素质教育问题的探讨上无疑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自此以后关于素质教育的探讨文章越来越多,素质教育逐渐成为一个专门的问题领域,引起

-
- ① 邓小平:《邓小平同志论教育》,200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
② 蒋南翔:《中小学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载《人民教育》,1985。

人们的极大关注。

20世纪80年代,素质教育逐渐成为一股教育思潮,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的。20世纪80年代初,面对新的技术革命的挑战和世界教育改革的宏观背景,为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人们深切意识到劳动者素质的重要性,人的“素质”问题成为当时国内外学者探讨的一个新话题。1983年3月12日,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同年3月28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1985年9月10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三条规定:“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使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提高民族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奠定基础。”《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既是全社会的任务,更是基础教育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上述文件和法规,都强调提高民族素质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强调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对科技发展、经济振兴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从方针、政策和法规的角度,确认了素质教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为构建素质教育理论奠定了基础,也为实施素质教育指明了方向。

第三阶段 1989—1993年,素质教育的深入探讨与全面实施。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小学素质教育研究广泛而深入地展开,专门探讨素质教育的文章日益增多。从1989年起,有关素质教育方面的文章可谓铺天盖地,素质教育专题研讨会不断召开。如1991年江苏省率先在全国召开素质教育研讨会。1993年12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管理研究会中小学整体改革专业委员会在辽宁沈阳召开以整体改革和素质教育为中心议题的研讨会,就

素质教育与整体改革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探讨。1985年 苑月 ,广州市就实施小学素质教育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议。一个研究与实施素质教育的热潮在全国逐步展开。

同时,党和政府有意识地营造素质教育的氛围,坚定不移地推行素质教育,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如召开了全国范围的素质教育现场会和经验交流会,举办多期教育行政干部素质教育研修班。如1986年,《江苏省教育委员会关于当前小学教育改革的意见》(试行)指出:“实施以提高素质为核心的教育,关键是要转变教育思想,树立国民素质教育的观念。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组织学校和教师学习教育科学理论,开展素质教育的研究和讲座并扩展到家庭和社会,唤起为中华民族的全面而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公众教育意识,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和良好的改革环境,推进小学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这是较早以政府文件的方式明确“素质教育”一词和确立素质教育地位的政策性文件。1985年 圆月 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基础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奠基工程,必须大力加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办出各自的特色。”《纲要》中提到“素质”一词的地方有 14处之多,并提出了全面提高学生源个方面素质的要求。1985年 猿月 1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再次提出:“改变人才培养模式,由‘应试教育’向全面素质教育转变。”这就以法律文件的方式,确立了我国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方向。1985年 圆月 国家教委在湖南汨罗举行全国素质教育现场会。《人民教育》《湖南教育》联合推出长篇报道,报道了湖南汨罗大面积推行素质教育的经验,为素质教育的改革实验从学校扩展到区域性、全国性奠定了基础。自此以后,全国首批建立了 14个素质教育实验区,一些省市也相继建立了素质教育实验区。中国教育学会 1985年 12月

在长沙召开以素质教育为主题的学术年会,标志着素质教育已经引起全国教育理论界的高度关注与深入探讨。1997年10月,国家教育委员会在山东烟台召开了全国中小学素质教育经验交流会,李岚清同志作重要讲话,朱开轩同志作了《全面贯彻教育方针,积极推进素质教育》的主题报告,柳斌同志作了总结讲话。会议进一步总结了汨罗、烟台等地大面积推进素质教育的经验,对实施素质教育作了全面部署,素质教育在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下,在全国全面推开。1997年10月,国家教委颁发《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此后,教育部把素质教育作为热点问题进行研究,1998年发表了专题文章《面向21世纪的基础教育改革:素质教育》。

江泽民同志对提高民族素质的民族创新能力非常重视。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指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的优势,关系21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又指出:“全党和全社会都要高度重视知识创新、人才开发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作用,使科教兴国真正成为全民族的广泛共识和实际行动。”“教育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各类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这是面向21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李鹏同志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实施全面素质教育,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和美育,改革教学内容、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以适应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要。”朱镕基同志在九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大力推进素质教育,注重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1998年,教育部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制定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经国务院1998年正式批转实施。《行动计划》明确提出要实施“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要求素质教育从以典型示范为主转向

以整体推进和制度创新为主,即主要通过课程教材革新、评价制度改革和师资队伍建设和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建设高质量教育。

1995年 9月、1997年 7月、1998年 9月和 1999年 9月,教育部委托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先后举办了以素质教育为主题的第一、二、三、四期全国地市教委主任研究班。素质教育逐渐成为一种政府行为和法律行为。

第四阶段 1999年以来,全面实施、推进素质教育的新阶段。

1999年 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并以素质教育为主题。会议的主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全党、全社会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出发,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构建一个充满生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奠定坚实的人才和知识基础。”江泽民在会议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各级各类教育都要把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受教育者的全面素质,作为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在我国进入了新的阶段。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素质教育为主题,在认识和政策方面有重大创新。例如,实施素质教育,不仅是跨世纪教育战线的重点工作,更重要的是党和政府的重要职责,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必由之路,也是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的大事。实施素质教育,不仅是基础阶段的任务,而且要贯穿于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等各个阶段,努力使德智体美等方面教育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实施素质教育,不仅要在考试评价、课程教材等教学领域改革方面有大的突破,而且要在改革教育体制、调整教育结构、优化教师队伍等方面进行配套。实施素质教育,不仅是学校教育的任务,而且是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

共同任务,是我国教育事业的一场深刻变革,也是一项关系全局和涉及社会各方面的系统工程。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必将对我国今后进一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产生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总结以上素质教育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发展的情况,可以看出,素质教育的演变大体有以下脉络:

第一,“素质教育”术语经历了一个由口号逐步发展到科学概念的过程。起初,“素质教育”这一术语只是偶尔出现的,它来源于实践,更多地归属于实践集团,采用的是一种口号的语言形式。而理论集团往往从既定的理论、范畴出发来诠释教育上的种种语词,采用的是学术性语言,对“口号式语言”有一种天然的排斥。因此,对于素质教育的定义产生了种种争论。可以说,无论反驳还是辩护,都有其理由所在。然而,社会科学领域的语词和概念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领域的语词和概念那么准确、严谨。限于一些理论的障碍、逻辑框架、语境,素质教育的定义问题可能还需要进行深入的探究。但是,根据目前的实践积累,也为了进一步推动实践,给素质教育下一个操作性的定义还是可以的。为此,原国家教委在《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中对素质教育的定义作了明确解释:“素质教育是以提高民族素质为宗旨的教育。它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的国家教育方针,着眼于受教育者及社会长远发展的要求,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宗旨,以注重培养受教育者的态度、能力,促进他们在德智体等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教育。”这一定义对规范素质教育的实践,提高素质教育的实施水平有较大的指导作用。

第二,素质教育实施的范围由基础教育逐步延伸到各级各类教育。最初探讨素质教育实施的范围局限于基础教育领域。随着理论探讨的深入与实践的发展,素质教育逐步突破基础教育领域,覆盖我国各级各类教育,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教育发展的宗旨与指针。

第三,素质教育实施的主体逐步由政府变为学校与教师,由

行政推动逐步发展为学校与教师自主的行为。从素质教育实践的发展演变来看,素质教育的推动最初更多地依靠政府部门,但在经历了一段大张旗鼓的宣传之后,素质教育思想深入人心,被广大的一线教育工作者所认识与理解,逐渐地变成教育工作者的自觉与自主的行为。学校与教师成为实施素质教育的主体。素质教育要在实践中取得实效,教师的素质至关重要。因此,建设一支优质高效能干的教师队伍迫在眉睫。

第四,素质教育探讨的重点逐步由宏观层面发展到微观层面。起初,人们较多地将素质教育探讨的重点放在基础教育与劳动者素质和民族素质的提高的关系上,也就是较多地探讨素质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随着探讨与争鸣的发展,人们对素质教育的探讨与研究逐步转向对素质教育自身各种要素的研究,包括素质教育的内涵、特点、目标、功能、内容、原则和途径等方面。人们更加注重教师素质的提高和课程内容的改革,突出课堂教学的效果。同时,对素质教育与学生个性完善、学生自我价值的实现等问题的探讨也逐渐增多,逐渐深入。随着研究重心的转移,素质教育理论在逐步深化。

第五,素质教育的研究方向逐步地由注重理论性探讨演变为加强操作性研究,即更多地关注如何在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最初,人们对素质教育概念的科学性,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全面发展教育、普通教育、基础教育等的关系,素质教育的内涵、特点、目标、功能、内容、原则等方面,从理论上探讨较多。而如今更多地关注素质教育的运行机制与管理体制,探讨素质教育的实施方法、途径与策略等问题。各学科如何实施素质教育的问题成为素质教育研究与实践的重点,也是素质教育赖以实现的基本途径。

素质教育思想在我国历史久远,素质教育的实践在我国方兴未艾。只有不断地吸取历史的教育智慧,把握时代的教育脉搏,回应时代的教育需求,建构系统的素质教育理论,才能推动素质教育改革不断深入,使其最终取得应有的效果。